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

哲学概论

阎孟伟 夏莹 谢永康 编著

sophy Ph
Philosoph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

哲学概论

阎孟伟 夏莹 谢永康 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概论 / 阎孟伟, 夏莹, 谢永康编著.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10-04548-8

I. ①哲… II. ①阎…②夏…③谢… III. ①哲学—概论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038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北京楠海印刷厂印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340 千字

定价: 3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序 言

陈晏清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都有一个长长的绪论，讲授时间占去大半个学期，内容归结起来也就是讲“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长达十几周的绪论课，确实让人觉得有几分枯燥，却也有不少人很愿意听它，因为他们在即将进入哲学的大门时，非常希望尽快地知道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哲学原理课的绪论其实就是一种哲学概论，不过它的视野相对狭窄，只是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门课的教学要求，讲些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相关的知识和历史。而我们现在开设的哲学概论课则是适应于整个哲学学科的教学要求的，可以说，它是整个哲学学科的绪论。

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课？哲学概论课是一门入门课，是为了把刚刚考进哲学系的学生领进哲学大门。从教学上说，它的一个浅近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找到一种适合于哲学专业的学习方法。只有适合于学习对象的性质的方法才是好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哲学概论要讲清楚的正是哲学的性质，包括哲学的本性是什么，体现这种本性的哲学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哲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哪些，等等。这些，也就是讲的哲学观。哲学这个学科比之其他任何学科来，都显得起点高，亦即门槛高。这个门槛在哪里？这门槛就是哲学观。许多人在接触哲学之前，就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或接触过其他学科的知识，但由于没有确立最基本的哲学观，不了解哲学的性质，便常常把学习其他学科的方法简单地移用到哲学学科的学习上来，最常见的就是用关于经验

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和学习哲学，因而总是不得其门而入。有的人从哲学系毕业了，甚至从事了多少年的“哲学工作”，但仍然蹲在哲学的大门之外；虽自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是在做“哲学”，却仍然“不识庐山真面目”，搞不清什么是哲学。学界许多哲学问题的争论往往源于哲学观上的分歧，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从事哲学教育的人们越来越看清了这种状况，并意识到了它同哲学教育的关联。于是许多哲学系的教授便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开设哲学概论这门课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做南开哲学系的系主任。处在这样的位子上，自然会对哲学专业的教学改革有更多的关注。当时，我觉得哲学系的课程体系，从内容上看不仅比较陈旧，而且比较松散，教学目标不大统一、不大集中。学界长期形成的学科分立的局面，在哲学系的专业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各门课程互不搭界，只是各自讲授自己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涉及哲学观的问题，也不是“大哲学观”，而多是“学科观”，如中国哲学史观、西方哲学史观、科技哲学观、美学观等等，甚至有的课程几乎只是知识课，而少有哲学味。学生毕业时，多是装着一大堆哲学知识走了，很难谈得上良好的、规范的哲学思维训练。这种局面是长时期形成的，要改变它也不是短时期里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在教学改革上做出多方面的持续努力。但若能够开出一门哲学概论这样的课，帮助学生把握各门主要课程在思想层面的内在关联，使他们能够在以后的学习中把各门主要课程贯通起来，这也不失为改变这种局面的一种努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批准南开大学哲学系建立“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哲学教学改革有了更好的条件和氛围。建设哲学概论课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和启动的。

本书的主编阎孟伟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1997年任哲学系主任。他对于哲学专业的教学改革有很高的热情和深入的思考，对开设哲学概论课的意义也有深刻的理解，便自告奋勇领衔这门课程的建设。孟伟也确实合适的人选。

他对哲学专业一些主要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都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并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他的率领下，几位教师合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南开哲学系本科一年级开出了哲学概论课。他们一边讲课，一边编写和修改教材。现在同读者见面的这本教科书就是他们十几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应当说，这是孟伟等人对哲学教学改革做出一个积极的贡献。

哲学概论课比较难讲。这不仅在于它是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起来的一门新科（建国以前的大学里曾有哲学概论课程），尚缺乏经验，而且在于它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特殊困难。最困难的是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个难题是，哲学概论主要讲哲学观，但并没有一种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哲学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哲学派别，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哲学观是历史地变化的，但变中又有不变。哲学概论就要讲清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如果只讲变而不讲不变，就把握不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规定性，讲不清到底什么是哲学；如果只讲不变而不讲变，那就没有历史，说到底也就没有了哲学。哲学的变革总是以哲学观的变革为先导的，讲不清哲学观的变化当然也就讲不清哲学的发展，到头来也就讲不清什么是哲学，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作为哲学史而存在的。可以想象，讲清楚这个“变”和“不变”的统一真不是件容易事。第二个难题是，哲学概论课是面向哲学初学者的，讲授内容的繁简难易很难把握分寸。过繁了，就不叫“概论”；过简了，说不清问题。太难了，学生接受不了；但一味地求“易”，就可能讲得不三不四。哲学课求“易”是有限度的，因为哲学的门槛本来就应当那么高，是不可能从它应有的高度降下来的。同样可以想象，做到内容的繁简难易适当，也真不是容易事。看得出来，本书的作者是在努力解决这两个难题的，是非常用心的。究竟解决得如何，最有发言权的、最终的评论者还是读者，是使用这本教科书的学生们。但我相信，这本教材、这门课程是一定会日益成熟的。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9
第一节 哲学之为智慧之学	9
第二节 哲学与科学文化	13
第三节 哲学与人文文化	27
第四节 哲学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40
第二章 哲学的基本特征	45
第一节 哲学的“反思性”	45
第二节 哲学的超验性	49
第三节 哲学的批判性	53
第三章 哲学的社会生活基础	64
第一节 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哲学文化的诞生	66
第二节 “感性世界”的实践本质	81
第三节 现代哲学中的“生活世界”观念	90
第四章 认识论：追寻求知之路	100
第一节 认识的本质及其来源	101
第二节 认识的可能性及其论证	113
第三节 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标准	142
第五章 道德论：善与正义	156
第一节 对“善”的追求与道德实践	157
第二节 道德信念及其根据	177
第三节 “善”与“正义”	194
第六章 审美论：美与生活	208
第一节 古代哲学中的美学思想	209

第二节 美与美学：美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19
第三节 进入生活世界的美学	243
第七章 本体论与形而上学	258
第一节 古代哲学中的本体论观念与实体论形而上学	259
第二节 近代哲学中的主体论形而上学与经验哲学.....	278
第三节 来自德国哲学的理论综合	292
第四节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重建	304
第五节 形而上学与信仰问题	315
英文阅读资料（1）	328
英文阅读资料（2）	342
人物简介	354
后 记	370

绪 论

说到哲学，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议论。在古代，“哲学”是“智慧”、“知识”的同义语，因而受到普遍尊重。而自近代以来，随着各种科学和学术门类的发展，随着世俗生活的进步，人们对哲学日益褒贬不一。一些重视实务的人，认为哲学空谈大道理，不切实际、不着边际，因而是“无用之学”；一些看上去崇尚科学的人，认为哲学的命题或理论，既得不到经验的证明，也得不到经验的否定，因而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一些喜欢文学、艺术的人，认为哲学总是在高度抽象的概念或观念中沉思，既无生动具体的形象，也无起伏跌宕的情节，因而“枯燥无味”，令人困倦；还有一些人认为，哲学的理论深奥难懂、晦涩不堪，令人“望而生畏”，进而“退避三舍”。总之，总有那么一些人，以各种理由，不喜欢哲学。

这里所说的是“一些人”，并不是全部。实际上，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同样重视实务，而且他们通常是事业的成功者，但他们认为哲学能够启迪人的深层智慧，训练和开发人的思维和判断能力，因而可以大大提高从事实务性工作的成功率；他们同样崇尚科学，甚至他们本人就是顶尖级的科学家，在他们看来，没有哲学，几乎也就失去了科学；他们同样喜欢文学、艺术，甚至他们就是受人推崇的文学家、艺术大师，在他们的心目中，哲学就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或灵魂。更不必说那些执著于哲学学术领域中的人们，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命价值、生活乐趣，他们的自尊、自信就存在于哲学思维的王国之中。

当然，并不是说自称“喜欢哲学”的人就真的尊重哲学的学术价值。在中世纪的欧洲，不少笃信基督教义的神父、牧师，也喜欢哲学，

并大谈哲学，但他们不过是把哲学作为论证宗教教条的工具，使哲学成为为宗教服务的“婢女”；历史上一些专权独裁的政客，也口称“哲学重要”，但他们不过是企图把哲学变成装饰政治阴谋、遮掩政治权术的手段，使哲学成为政治的“奴仆”。生活中，还有一些人，他们也乐于在酒后茶余，大侃哲学，但充其量不过是玩弄哲学词语，不得哲学真谛，其目的是附庸风雅，以期博得他人的廉价“钦佩”。总之，这样一些人，其“喜欢哲学”，不过是喜欢把哲学变成他们手中的工具或玩物。不能小看这些人物，哲学的名声大都糟蹋在这些人的手中。

从上述人们对哲学褒贬不一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喜欢哲学的人，未必真正知道“什么是哲学”，即便说“喜欢哲学”的人，也未必真的懂得哲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越是不懂哲学的人，就越容易对哲学说三道四，就越容易对哲学持反感、厌烦的态度，或者越乐于玩弄哲学。因此，无论是为了领略哲学的基本精神，还是为了清除对哲学的种种误解、曲解、偏见、伪见，我们都有必要对哲学的本性、哲学的存在价值、哲学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一、哲学：面向生活之“思”

理解哲学莫过于首先理解哲学和生活的关系。所谓生活，就是指人的生命活动，即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总和。也就是说，生活首先意味着我们要做很多事情，不做任何事情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生活。动物在其生命历程中当然也要做很多事情，因此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那么，人的生活与动物的生活有什么基本的区别呢？区别只在于一点，人不仅要“做”（doing），而且要“思”（thinking）。动物则只“做”不“思”，亦即它只是按照自己的生物本能去应对环境中的各种事物，而并不思考自己的活动，至少不能像人那样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人则不同，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做”是与“思”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做事之前，还是做事之后，都要思。古人云“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人的生活实践不能无“思”，那么“思”什么呢？生活实践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因而人们面向具体生活内容的思考也是丰富多样的。然而，概括起来说，无论人们做什么事情，都必然要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思考：其一，“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二，“我怎样做这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涉及我们对做事的目的和意义的思考，因而可称之为“价值之思”或“意义之思”。毫无疑问，任何人，除非被迫和无意，绝不会做自己认为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事情。欲做其事，必先确定其意义。第二个问题涉及我们做事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可称之为“方法之思”或“手段之思”。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做事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恰当的手段，那么无论所做之事多么有意义，也是终究不能成功的。由此可见，对于人的活动或生活来说，“价值之思”和“方法之思”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无论是“价值之思”还是“方法之思”，只要我们思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我们的思索引向深处。例如，当我们在确定做某件事是否有意义、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对“什么是有意义”或“什么是有价值”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因为如果我们对“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或尺度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就很难对所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有价值进行明确的判断，从而陷入苦恼和困惑。再如，当我们去思考如何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在各种可能的方法中进行选择，由此引发我们对“什么方法是正确的方法”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进而引发我们对“方法”本身的思考，因为如果我们对于方法，特别是正确的方法，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我们就很难在方法是否正确、是否恰当问题上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同样会使我们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这样的思考，往往会使我们超出对思考的具体内容或对象的理解而转向对我们在思考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的理解。例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的追求也体现出我们做事的意义，但当我们对同一事物美与不美的判断发生分歧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争论中转而追问“美本身”即“美”的概念是什么，或者说怎样给“美”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我们的思考越是向深处追索，所遇到的问题也就越多。无论是对价值之思的理论思考，还是对方法之思的理论思考，都会使我们发现自古以来人们对价值、意义、方法等等的理解充满歧义，如果不对之做出深入的理论辨析，就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无论我们的思考面对多少问题，我们总能发现，我们的思考不仅指向思考的具体的经验内容，而且指向了思考本身，也就是把我们的思考本身作为对象加以思考。这正是哲学事业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即对思考的思考或“反思”，表现为对思想的反复追问，对思维的形式和方法的反复追问。哲学就是关于“思”的学问。对价值之思的“思”，会使我们去追问人性、人生、人的社会生活的本性，追问人的存在的崇高价值和尊严，这个追问或反思就构成了哲学的价值论，它包括人性论、人生论、道德论、审美论等等。对方法之思的“思”，则会使我们反复追问，正确的方法是否来自于对事物本性的正确理解，我们的思维是否能确切地把握事物的本性，我们的思维形式和方法又是如何产生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个方面的追问或反思，就构成了哲学的认识论，它包括了知识论、方法论等等。最后，当我们试图把价值之思和方法之思统合起来，为我们的思考确立统一的、最终的依据时，或者，当我们怀疑我们的思维是否能够真的获得这种统一的、最终的根据时，我们的思考就会达至一个高度抽象的思维领域，这就是哲学的本体论。

二、哲学：文明的守护者

哲学既然是关于“思”的学问，只要我们在“思”，我们就离不开哲学。但说到这一点，又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为哲学的生存空间而奋力，但直到今天，哲学依然没有摆脱受轻视、受冷落、受误解的境况。柏拉图曾经抱怨，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城邦能够为真正的哲学家提供生长条件；黑格尔也曾批评说，政府对哲学的漫不经心迟早会受到一种惩罚——“一切透彻认识的沦丧”。历史上，很少有哲学家能地位显赫、富贵荣华地度过一生，绝大多数人都寡淡清贫，甚或颠沛流离、

穷困潦倒，他们的“在世”也更少享受众星捧月般的荣耀。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哲学不就是在这样一种境况中顽强地生存并成长起来的吗？并且，它永远不会为世俗的偏见所淹没，更不会被浅近的政治目的和功利行为所压倒。也许，哲学的高贵和荣耀，就在于它的这种顽强和自信！这种哲学的顽强和自信！

哲学的自信当然不是来自于哲学家的自恋，而是来自于一种确信，即确信在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中，有一种责任只有哲学才能承担起来，这就是守护人类文明。可以对哲学做各种各样的界说，但任何一种界说都不能否认，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所谓“高度抽象”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哲学家沉湎于“纯思”的自我陶醉，而是人类理性担当文明守护者的方式。哲学所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范围广阔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和产物，它每前进一步，都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和这种智慧的运用。然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很清楚，没有任何铁的必然性可以保证这种智慧的运用能够总是确定无疑地培育出积极的、健康的文明果实。因而，在我们的这个文明世界中，始终存在着科学与迷信、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非正义、和平与战争的反复较量，使我们一直困扰在“to be or not to be”（存在还是非存在，或者，生存还是毁灭）这样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中。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对文明的进步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性思索，需要我们对生活世界保持批判的态度，需要我们把一切具有历史进步价值的因素从扑朔迷离的生活现实中提炼出来，让它们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呈现出来，并通过理论的整合，使它们成为引领文明进程的方法、尺度和标准，防止人类文明毁于浅近的功利行为和邪恶的政治目的。由此观之，当哲学运用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探索并形成能够统摄巨量经验的范畴体系、思维形式和价值准则的时候，它所做的不正是这样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工作吗？当它用理性的批判精神去涤除一切阻碍文明的因素和障碍时，它不就是在承担文明守护者的重要责任吗？

我们并不否认，哲学和哲学也很不相同，哲学家们做着同样的工作，但并不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哲学领域充满了不同思潮、派别之

间的对立和斗争。这往往会使那些对人类文明抱有纯净愿望的人对哲学感到沮丧。然而，这并不是令人沮丧的境况，而恰恰是人类健全理性的生机和活力。人类智慧原本就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不断发育、不断增长、不断提升的生命历程。这种发育、增长或提升，恰恰就是在各种哲学思维的相互批判中实现的。一种新的哲学否定了较旧的哲学，也可以说，是那些较旧的哲学孕育了这种新的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不是向我们提供现成的智慧大餐，而是要我们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思想批判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既提升我们个人的智慧，也提升人类的智慧。每个哲学家，乃至每个人都有权对事关人类文明的事情做出独立的、自由的思考，都有权把自己的理性奉献给人类进步事业。哲学不是向人们宣布真理的地方，而是人们探索真理的地方。哲学对文明的守护不是让人们的思想窒息在僵死的教条中，而是让人们的自由理性活跃在批判的舞台上，从而把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奠定为人类文明的唯一原则。只有那种自认为把握了绝对真理，并强迫人们去接受这种“真理”的哲学，才是欺世盗名的伪哲学，它给文明带来的不是生机勃勃的活力，而是一种足以毁灭一切的死的精神。

说哲学是文明的守护者，当然不是说，只有哲人或哲学家才是文明的守护者。人类文明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有机体，它的每一个细胞或器官都是这个不断成长着的有机体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因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法学家、哲学家乃至每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人，他们的勤奋工作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发育和生长。当他们不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同时也是为了推进人类文明的时候，当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事业同人类文明的进步价值保持一致而不使其玷污乃至损害这个有机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文明的守护者。因为，当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的时候，所从事的正是一种哲学，一种不是把智慧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的哲学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即便是哲学家也未必能承担得起守护文明的责任，因为，谁又能保证这种人在强大的功利诱惑和政治胁迫面前还能够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文明的守护者，但要能够自觉地承

担起这种责任，就需要这种哲学精神。对此，哲学家更是责无旁贷。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要塑造和传承这种精神，就是要通过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来凝聚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并为其发展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

三、哲学教育：培养爱智者

哲学作为文明的守护者凸显出哲学教育的重要性。哲学教育既是一种专业性的教育，更是一种理论素质的培养。所谓专业性教育，就是指哲学学术人才的培养，使接受哲学教育的学生掌握哲学的理论和历史，具备进行哲学学术研究的能力；所谓理论素质培养，简单地说，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爱智者”，使他们对知识或智慧有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追求，培养他们树立执著的学术精神，把对智慧的热爱变成对智慧本身的热爱，而不是仅仅把智慧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把所有哲学专业的学生都培养成哲学家。虽然，我们始终有责任通过哲学的专业性教育，把学生中的佼佼者并有志于哲学学术的学生培养成哲学学术研究的专门人才，但这毕竟只是指向有能力且有志向从事于此业的少数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爱智者”，也就是使所有学生都能把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视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不管学生在学业完成之后做出怎样的职业选择，这种“爱智者”的精神会使他们终身受益无穷。因为，这种精神会使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事业的成功，并通过这种成功来体现自己的智慧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使自己的事业被浅近的功利目的所阻断。

要把学生培养成“爱智者”，就必须在教学中坚持学术的主导性。所谓学术的主导性，简单地说就是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们必须尽可能完整地向学生传授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历史知识，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并有责任通过哲学理论和历史的传授使学生领悟哲学家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质，潜移默化地将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品质内化到学生的人格结构中；其二，我们必须在

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把哲学所包含的学术问题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如实地告知学生，使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并通过对问题的思索深化对学术理论的理解；其三，我们必须鼓励学生从进入哲学领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进行尝试性的学术研究，强化对他们的学术训练，使他们掌握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逐步提高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使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成为他们的习惯，并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体验学术研究的艰辛和乐趣。

坚持学术的主导性，培养“爱智者”，这应当成为哲学教育和教学的基本原则。我们确信，越是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越是有能力从事哲学学术研究的人，就越是有能力从事其他任何一种研究的人，也就是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一个爱智者对智慧的勤勉追求？如果一个人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基础和能力，能够有能力享受“爱智者”的快乐，那么不管他是否以哲学为业，都最有可能成为事业的佼佼者。而且有足够的可以证明，经过了严格哲学训练的学生，他们往往有良好的能力掌握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理论，有良好的能力对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有良好的能力在各种社会工作中积累经验并迅速掌握实际工作的知识和技能。

哲学并不仅仅是哲学家的领地，而是一切有志于推进人类文明的人们的共同事业。哲学的生命力存在于人的理性能力和批判精神中，因此，哲学的全部责任就是要让人的理论思维在人类文明的思想高端中自由驰骋。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哲学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因而每当哲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特别是那些哲学家，都会提出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哲学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反复被追问，反复被重新解释的问题。

第一节 哲学之为智慧之学

我们首先可以说，哲学是一门人类最古老的学问。在英语中，“哲学”一词是“philosophy”，它源于希腊文“φιλοσοφία”，用拉丁文表示，则由“philein”（爱）和“sophia”（智慧）两个词根构成，其意为“爱智慧”。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文化中，哲学既是“智慧”，也是对智慧的一种态度。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研究哲学就是摆脱无知，追求智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没有“哲学”这样一种单独的学科门类，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但是在中国话语系统中，对“哲”字的解释，与西方人对“philosophy”一词的解释大致相同。如《尔雅》中解释：“哲，智也”，也就是说，“哲”就是“智慧”的意思。有智慧的人，就被称为“哲人”，如《尚书·皋陶谟》中说：“知人则哲”，再如唐代名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明哲乎？”根据对“哲”的这种解释，19世纪，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日本著名哲学家西周首次用汉语“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即认为哲学是一种使人热爱智慧、增进智慧的